

《周易》经传中龙马精神的 演变和阐释^{*}

孙亚丽

【摘 要】龙马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特质，其基本内涵形成于《周易》。《周易》卦爻辞中的龙马意象主要展现于《乾》《坤》卦中，两卦阴阳爻的转换与交融促使龙马意象相结合。借助符号、卦象和卦德赋予的意义，龙马意象从天地之道推衍至君臣之道。《易传》对龙马精神的建构在以普遍的天道为本的同时，泛化为广义的人生信念。龙马精神呈现为刚健、柔顺的价值原则与积极进取、宽容厚德的精神相融合，其中既有方法论，也指明实践目的，具体展开于经天纬地、安邦济世及主体自立方面。龙马精神的演变与《周易》的类比联想思维方式密切相关。

【关键词】《周易》 意象 龙马精神 思维方式

【作者简介】孙亚丽，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讲师。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1125（2024）01-0019-16

“行天者莫若龙，行地者莫若马”，^① 古人对龙马的形态想象非常丰富，对其精神风貌也有很高的期望，所谓“龙马精神海鹤姿”。^② 《辞海》《中国成语大辞典》等辞书中的传统解释认为，龙马指传说中的骏马。龙马精神，就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022年校级项目“《周易》中的龙马精神”（校20220060）的研究成果。

^① 李道平撰，潘雨廷点校：《周易集解纂疏》，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69页。

^② 李郢：《上裴晋公》，沈德潜选注，刘福元、杨新我等点校：《唐诗别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529页。

是像龙马一样精神焕发,形容健旺非凡的精神。^①《周易》经文中以乾为龙、坤为马,马行千里,与龙偕行。龙马意象是《易传》构建龙马精神的基础,其精神内涵常被用来表征君子的德行修养。《乾》《坤》中龙马意象表征的价值原则呈现为一种互补和融合,赋予意象以生命精神和宇宙精神,龙马精神遂成为中国自古以来崇尚的健行不息、厚德载物、不断向上的民族力量。可以说,《周易》对构筑中华民族崇尚的龙马精神的思想内涵和欣赏习惯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周易》中的意象简称为易象,二者为种属关系,易象从属于意象。从研究易象的发生、发展而言,《周易》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易象奠定了中国文化中的意象母题,影响了中国意象文化含义的延展。《周易》中的龙马意象和先秦文化的精神层面有内在的联系,是易学与文化的深层次融通。文化精神层面对易象的滋养形成某种意象和特定的境界,决定易学的思想意义和文化价值。正如荣格所说,“每一个原始意象中都有着人类精神和人类命运的一块碎片,都有着在我们祖先的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和悲哀的一点残余”。^②易象是《周易》时代人们潜意识的内容所在,是人们共有的心理遗传和精神信仰。《周易》中的龙马作为天地意象的载体和媒介,在具体境遇中被设定相应的内涵,被赋予人的生命精神,不断演绎和拓展着生生不已的宇宙精神。

目前学界对龙马精神的研究主要着眼于与龙马动物身份相关的起源、图腾崇拜等文化史主题,亦有若干论文从《诗经》《楚辞》等文学作品中寻找马意象与龙马精神的关联,还有从生态学层面讲论《周易》生命精神等的文章,^③这些研究颇有启发意义。然而,从整体来说,学界对龙马精神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还远远不够。意象研究存在不同的研究方向,或以读解

① 参见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3793页;王涛等编:《中国成语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767页。

② [瑞士]荣格:《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冯川译,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76页。

③ 参见王东:《龙是什么:中国符号新解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王笠荃:《中华龙文化的起源与演变》,气象出版社2010年版;沈泓:《中国精神:民间图像中的信仰幻影》,中国财富出版社2013年版;王伟:《从楚辞的龙马精神论其与殷商文化之关系》,《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47~49页;王精明:《〈秦风〉中的马意象及其文化精神》,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施爱东:《中国龙的发明:16—20世纪的龙政治与中国形象》,三联书店2014年版;牛倩:《〈西游记〉“龙马”形象意义生成考——兼论“天马”与“龙马”的关系》,《明清小说研究》2018年第4期,第63~67页;陈雪军:《〈诗经〉中龙马文化精神内涵探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第93~99页;张涛:《〈周易〉“自强不息”的历代诠释》,(转下页注)

《周易》为目的，或以研究易象的发生发展为目的，二者既有联系又有不同。本文从中国文化瑰宝《周易》考察龙马意象的本义，探究龙马精神的发生、成长和定型的过程，以期重新认识龙马精神及其现实意义提供新的视角。

一、《周易》卦爻辞中的龙马意象

《周易》的法则来自对自然现象的摹写，以物象相互作用说明万物的形成和变化，并通过设卦观象，立象尽意。“意”是感悟的目的，是本体；“象”选取的具体事物是媒介，是喻体。《系辞》中“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①作《易》者从爻象到卦象，模拟大自然之象，在意识领域创造了恢宏的宇宙模式，从形象思维跳跃到超越客观世界的意象思维，这便是形象—观念—意象的思维过程。这一思维过程采取类比联想思维方式，即借助一种具体的“象”进行认识、比附，推论出一个抽象事理的思维方式。《周易》的象数思维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上，以阴阳符号构建卦象，由卦象感悟卦德，实现推天道以明人事，引导天人合德。

龙马在《周易》经文中以动物意象出现。《周易》卦爻辞大多模拟自然物象，也有纯粹的虚拟之象。其中，动物意象非常突出，约有20种动物出现，而龙马意象出现的频率最高。在《周易》中，龙象共出现35次，主要是在《乾》卦；马象共出现21次，分布较广，以《坤》卦为主。《乾》《坤》蕴含着《周易》核心的精神内涵，统领其余62卦。《周易》中龙马意象分别出现在《乾》《坤》等卦爻辞以及《彖》《象》《文言》《系辞》中，借助阴阳、刚柔变化的演绎，龙马意象的内涵逐步形成并紧密相连。

（接上页注）《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44~53页；吉成名：《龙马传说与龙马精神》，《文史杂志》2002年第5期，第82页；徐佩瑛：《中华民族的尚马传统与龙马精神》，《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第45~46页；孙喜艳：《〈周易〉美学的生命精神》，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韩]金演宰：《〈周易〉的生态观与可持续发展的世界——以生命精神为中心》，《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第1~8页；李炳海：《部族文化与先秦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高怀民：《先秦易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① 本文引用的《周易》原文皆出自王弼等注，孔颖达等正义：《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为了行文的简便，以下一般采取文中夹注的形式。

《周易》卦爻辞中的龙意象主要体现在《乾》卦中，《坤》卦上六爻也出现了“龙战于野，其血玄黄”之龙象。从《乾》九四“或跃在渊”、九五“飞龙在天”来看，《周易》中的龙可上可下、可飞可潜，乃变化多端、阳刚健壮之物。后人在阐释《乾》龙时，多认为龙乃虚拟物象，《周易集解》引沈麟士的解释：“称龙者，假象也。”^① 卦爻辞中也未具体描述龙的形象，但《周易》把龙当作一种动物。《系辞》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龙蛇休眠以保存生命。在《说卦》“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八卦的动物意象中，龙与马、牛、鸡等动物平列，龙被当作了动物。按照《说卦》的解释，“震为雷、为龙”，龙与雷联系在一起。《说卦》曰，“动万物者莫疾乎雷”，震雷是促进万物生长的强劲动力；又云，“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雷与东方相配，五行中把青龙、白虎、玄武、朱雀与四方相对应，青龙配属东方。李炳海在《部族文化与先秦文学》中认为龙图腾和雷图腾源自太昊氏，是史前时期的产物。太昊氏就把龙与雷作为自己的双重图腾，东夷族的原始雷神便以龙的形象出现，这反映了龙图腾的地域特点。^②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曾描述龙的形象：“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长能短。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③ 许慎认为龙具有“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长能短”的变易性以及“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的时中性，这与《说卦》中对震龙出东方的描述相类。往来幽明、化长变短之变易能力，表征着天道生动流行、变化运转，在毫无滞碍中创发出宇宙生命气象。春登秋潜的时中精神，代表着天道化育、逍遥自在的随时精神。同时，《彖》中也描述“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首出庶物，万国咸宁”。阳气乘着六条巨龙驾驭自然，龙象周流不息，天下万方和美昌顺。《周易》中的“龙”蕴含着巨大的创生力，绵延万物，生生不息。

《乾》卦为“首出庶物”的第一卦，龙象主要体现在初九、九二、九四、九五、上九及用九爻辞，作《易》者把《乾》卦的阳爻想象成一条龙，并且是不同时间、地点以及不同形态的龙，讲述龙运行的过程及其发展规律。初九爻“潜龙，勿用”，初九位于事物的初始阶段，此时的龙潜伏着。“勿用”，孔颖达解释为“言于此潜龙之时，小人道盛，圣人虽有龙德，于

① 李道平撰，潘雨廷点校：《周易集解纂疏》，中华书局 1994 年版，第 28 页。

② 参见李炳海：《部族文化与先秦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6 页。

③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82 页。

此时唯宜潜藏，勿可施用”，^①这是从现实功用而言，“用”为行动，此时有一定的限制条件。从事物发展过程来看，正如《文言》曰：“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初九爻处潜龙之时，条件不成熟，君王不宜有所行动。

《周易》最初是一部算卦书，并非为普通民众服务，而是用于君臣治国理政。商周时期，受天人合一学说影响，实行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君主采用神权政治的手段统治社会：一方面借助算卦的形式，使巫史等成员参与国事，主文谲谏；另一方面借助卦爻辞的占算结果约束君臣的行为。对君臣来讲，其最关心的莫过于占筮结果。因此，九二爻“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中所言“大人”应为君王等贵族。九二爻的龙经过初期的潜隐，此时已行进到地面上。这意味着如果君王贵族算到这一爻，非常有利。言外之意，小人推演到这一爻并不好。从初爻到九二爻的龙在不断积蓄力量，意味着君王当韬光待时，以成其行。这中间经历各种磨炼，九三爻、九四爻便展现对龙、对君王的考验。

九三爻讲“君子终日乾乾”，实际暗含龙象运动过程，王弼认为“‘乾’体皆龙，别而叙之，各随其义”。^②九三爻是下卦的最高阶段，已临近上卦，此时多惧。“夕惕若厉”，不仅白天不停努力，而且到了晚上也不能松懈。九三爻怀着警惕之心，只有不停地进取，才有可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周易》有深沉的忧患意识，这根源于大自然阴阳不测的强大威力以及人们世代相传的恐惧心理。但这也并非无解，作《易》者认为可以德解忧，“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系辞》）。自始至终，谨慎而为，即使遇到险境，也会化解。

发展到九四爻，面临“或跃在渊”的选择，须有理性精神。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理性。^③此理性并非西方传统哲学中的理性，西方传统哲学将理性视为人们认识事实真理的能力或对象世界的本质结构等，中国的理性精神更重视人们寻求生活真理的能力。因此，对九四爻，做出怎样合理的选择才能趋吉避凶呢？九四临近九五君位，“或跃在渊”，一种解释为有时飞跃，有时沉入深渊；一种解释为有的人跃入龙门，有的人

① 王弼等注，孔颖达等正义：《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

② 王弼等注，孔颖达等正义：《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页。

③ 参见梁漱溟：《梁漱溟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02页。

沉入渊底。《乾》卦讲为君之道，前一种理解更合适。从客观条件看，临近功成时，往往起落幅度较大。从主观来看，君王需要有一种平静通达的心理状态，做好应对，飞跃时不忘乎所以，沉渊时不消沉低落，能理性地涵容波浪不平。

九三、九四两爻龙象步入进退维谷的处境，危险与机遇并存。“夕惕若厉”的忧患意识，加之理性选择，不躁进求成，进退之时谨慎处之。只有步步为营，才能蓄势待发，实现九五“飞龙在天”。在时、势、位、才、德等天时地利人和皆备之际，毫无保留地、全方位地展现自我，尽善尽美地实现天地之大业。圆满之际也意味着即将有所亏损，上九爻“亢龙有悔”，上九居卦之极，穷高曰“亢”，龙飞超出自身能力所限，意味着危险，穷极生变。变化的一种可能，正如《坤》卦上六爻“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描述的阴阳相战的结果。上六爻居《坤》卦之极，以阴爻居阴位，阴盛已极，故有“穷”之象。上六与卦外之阳争斗，互不相让，以致血泣天地。《乾》卦六爻皆为龙，六条龙循环往复，正如《彖》曰：“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卦每一爻都是一条龙，在时间和空间中不断变化。万物在“云行雨施”、气象优美的自然环境中流动变更其形态，这就是六爻生长变化的过程。到达用九之时，“见群龙无首吉”，六条龙没有地位之差异，共同为主，形成合理、有序、民主的管理模式。《周易》中的龙象在进取、争斗中最终走向和谐。

马意象在《周易》中代表吉祥如意。《周易》在述说艰难困苦之时，往往因壮马获救，化凶为吉。例如，《明夷》卦象是火在地下，喻示光明陨落。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六二时左股被伤，不能行走，借助壮马拯济之。《涣》讲涣散之时如何凝聚人心。初六“用拯马壮，吉”，震为马，初爻上承互震，拯马之象，初六阴居阳位，上承九二，应以退为进。亦如《中孚》六四爻“月几望，马匹亡，无咎”，震为马，善动之性。六四在互震中，上承九五之阳，所以无咎。再如，《屯》卦六二、六四爻中的马象皆阴爻，用历史的、动态的画面演绎屯难时期的状况。六二“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屯”“遭”皆为不能前进之义，六二爻前遇阴爻得敌，所以不利前行。“班如”指马很多的样子，六二处震卦，震为马；又处互坤中，坤亦有马象，马前后班列，行列不前。在远处看不清楚，走近才发现是“匪寇婚媾”，这队人马未带兵器，是求婚的。六四再次描述“乘马班如，求婚媾”，而到上六爻则出现“乘马班如，泣血涟如”之象，上六居卦之极，上无所进，下无所应，处坎险中，屯难之极，须静观审势。《周易》中的马象皆与诸卦的阴爻相配，与坤卦、

震卦相联系，在爻位间承乘比应的复杂关系中发展变化出有利的外在条件，化凶为吉。

龙马意象的结合与《乾》《坤》卦密切关联。《乾》六爻都是阳爻，如果六个阳爻变成阴爻，就成了纯阴之《坤》卦。《坤》卦辞“元亨，利牝马之贞”，与《乾》卦辞“元亨利贞”不同，《坤》在“利贞”间增添了“牝马”，从字义来看，“牝马”为母马，表柔顺之意。母马有一个特性，就是永远追随公马，公马指引着方向、速度，彼此相互陪伴。拥有柔顺之质的动物很多，比如牛，牛比马更吃苦耐劳、更顺从，为何选马呢？马象不仅博大柔顺，而且任劳任怨。《周易》设定卦爻辞是有一定条件限制的，但并非绝对的。取马者，原因有二。一方面可能是《坤》卦与《乾》卦相配。《说卦》曰，“乾为马”，则坤为母马。《坤》柔顺，《乾》健行。如果《坤》卦柔顺却不健行，则不能与《乾》卦相匹配。另一方面，牝马能承载重物，广行无疆。正如孔疏：“不云牛而云马者，牛虽柔顺，不能行地无疆，无以见‘坤’广生之德，马虽比龙为劣，所行亦能广远，象地之广育。”^①人们认为牛是负重的，而马行动迅速轻快。再者，牛性柔顺，往往无条件随从，而马忠贞不二，不会盲目顺从。另外，牝马又能繁育，这正好符合《坤》载万物而资生之意。

“利牝马之贞”具体解释为“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坤》卦辞）。《坤》为纯阴之卦，代表终成之意，“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系辞》）。《乾》代表创生万物的开端，《坤》代表万物皆赖坤元而有其生，生为成熟生长，“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彖》）。如果没有《乾》的开创与引领，《坤》就有可能迷失方向。《坤》卦主臣道，顺承《乾》君，当君主有所行动时，为臣者不能事事抢先，要随顺其后。《坤》为纯阴之卦，向往《乾》阳。《坤》卦辞以马意象做譬喻，说明《坤》德在于柔顺、居后。在具体行事方面，君子须“直方大”“无成有终”（《坤》六二、六三爻辞），胸怀广大，谦谨而有原则，功成而居后。

总之，《周易》卦爻辞中的龙马意象主要集中在《乾》《坤》两卦中，《乾》卦以龙设象，《坤》卦以马设象，讲述龙马意象在特定时、位表征占断结果，没有明确阐述龙马意象背后的生命精神，但卦爻辞中的龙马意象是《易传》形成龙马精神的基础和核心。《乾》卦爻辞描绘了“潜龙”“见龙”“跃龙”“飞龙”“亢龙”“群龙”六种形态。《坤》卦爻辞展现的是“牝马”

^① 王弼等注，孔颖达等正义：《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发展到上六时出现龙马相战的结果。《周易》卦爻辞中的龙马意象借助符号、卦象和卦德三个方面获得意义。从符号言，阴为臣，阳为君。从卦象来看，乾为天，为公马，为君；坤为地，为母马，为臣。大地顺承上天，母马顺承公马，臣子顺承君主。从卦德言，乾为健，坤为顺。《乾》《坤》中的龙马意象处于不同的爻位中，面对不同的时空条件，其运动过程也相随而变。《坤》为纯阴之卦，向往《乾》阳。《坤》卦的精神在于配合《乾》卦，与《乾》共同由理想走向实践，此即“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者。

二、《易传》对龙马精神的阐释与建构

《易传》对龙马意象的描述主要体现在《彖》《象》《文言》《系辞》《说卦》中。经文中的龙马意象多是推断吉凶的中介，在卦意、卦爻辞的时空关联中展现其意义。《易传》对卦爻辞的解释，去除了一些神秘诡谲而予之人文色彩，龙马意象成为连接天人的中介；《易传》对龙马意象的解释从天地之象、君臣之道扩展至更广泛的群体。龙马精神成为普遍的君子德行和精神风范；在以普遍的天道为本的同时，泛化为广义的人生信念，逐渐衍化为儒家价值体系的重要原则。《易传》阐释龙马精神具体展开于经天纬地、安邦经世及主体自立方面，既有方法论，也指明实践目的。

《易传》建构了龙马精神的价值本体。《乾》《坤》卦辞讲“元亨利贞”，在占筮时代表示事物发展吉利亨通的愿景。到了《易传》时期，实现了神学向哲学的转变，便是“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乾·彖》）。“大明终始，六位时成”（《乾·彖》）是乾道变化的过程，道在阴阳的生长变化过程中显现“乾道变化”。万物每一品类同在乾道变化的过程中定其性命，所成万物保持相互间的合作，即“保合”。彼此间不冲突，得其所成，最后提升到更高一层才能达至“太和”。《彖》从本体宇宙论角度阐释，“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万物凭借依赖之而有其存在，乾元使万物存在。《乾》卦蕴含着深藏在天地万物中无限的创生能量，与《坤》卦阴阳结合，生生不息地绵延着万物之生命，“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乾·彖》），“‘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坤·文言》）。

《易传》在此基础上，又将主体生命置于社会秩序中阐释其存在的意义。“元亨利贞”的卦辞给我们描述了万物化生的天在创生过程中呈现的不同特征，“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

(《文言》)。自《易传》言之，元亨利贞与仁义礼智相配，元即仁，亨即礼，利即义，贞即智。犹如程颐在《伊川易传》中所讲：“元亨利贞，谓之四德。元者万物之始，亨者万物之长，利者万物之遂，贞者万物之成。”^① 依据《易传》所示的思路，“元亨利贞”是一种道德精神。元是道德精神之本，是天道之仁。“人与他人精神之感通，人与他人间之浑然一体之情，此乃一切德之始。礼为人对他人精神之尊重与肯定。义为人我之各得其正。智为人我之成已成物之事之完成而条理见。”^② 这种道德精神贯穿于人与他人精神的关系中，关怀生命，展示生命的形式，探求人之为人的生命意义和存在价值。在《周易》中，天道为人道之本，但形而上的天道本体并没有超然于价值领域之外，它多方面地呈现为现实的价值原则。《乾》《坤》两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地之道表现为刚健柔顺的趋向，在人生领域具体化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价值原则。

《易传》中的龙意象表征自强不息的价值原则，具体表现为积蓄能量、刚毅进取、勇于担当及适时而变等内容。由“经”到“传”，龙不仅是符号，而且具有了生命主体的地位。《乾》初爻、二爻讲述龙在不断积蓄力量，展现生命力的凝聚和内敛。九三爻、九四爻居于上下卦变化之际，在重重忧患之下，仍能心志守道、坚忍不可拔，体现了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苏轼特别推重九三爻：“夫初之所以能潜，二之所以能见，四之所以能跃，五之所以能飞，皆有待于三焉。甚矣三之难处也！使三之不能处此，则‘乾’丧其所以为‘乾’矣。天下莫大之福，不测之祸，皆萃于我而求决焉。其济、不济，间不容发。是以‘终日乾乾’，至于夕而犹‘惕’然，虽危而无咎也。”^③ 苏轼认为九三爻在诸爻中极富担当精神，这种担当精神与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以及欧阳修所说的“以天下之忧为己忧，以天下之乐为己乐”^④ 是完全一致的。《文言》中解释道：“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君子刚健有为，需要进德修业，积蓄力量，审时度势，以天下为己任，居上不骄，居下不忧，更为挺拔，更为沉毅。在成就大业之时，怀有忧患意识，无私无畏，尊重所有，在功成名就时全身而退。此际察观

① 程颐：《伊川易传》卷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57页。

②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九州出版社2021年版，第79页。

③ 苏轼著，龙吟注评：《东坡易传》，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④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562页。

《乾》卦，只见龙象缥缈，龙德已显，是一条充满了无限创生力的龙。《周易》中的龙隐喻的是一种崇高的理想，即“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乾·文言》）这么一种天人合德的境界。

《易传》中的马意象表征厚德载物的价值原则。《坤》卦为纯阴之卦，代表终成之意，“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系辞》）。《乾》代表创生万物的开端，《坤》卦代表万物皆赖坤元而有其生，生为成熟生长，“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彖》）。如果没有《乾》卦的开创与引领，《坤》卦有可能迷失方向。《坤·彖》曰，“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厚德载物”既是修养的标准，也代表终成原则。厚德的修养需要一个过程，《文言》在论述这一过程时往往注重“时”的特点。例如，《坤·文言》曰，“‘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事情的发展总会由量变到质变，“几”最重要。宋代邵雍认为“阴几于道”，^① 阴比较接近于道，因为阴具有普遍、恒常不变的特性。阳是可知可见的，是有；而阴是不可知不可见的，是无。天主用，地主体。体主静，对应的是阴，是大地。“几”的发动有好有坏，若能在发动之时及时察觉，则可把坏的去除。若任其发展，“几”变成了势，就很难转化了，需要承受这个结果。所谓随时之义，就是根据具体的时间条件和特定情境灵活应变，因时而变，待时而动，以决定主体自身的安危。

另外，《乾》《坤》中龙马意象表征的价值原则并不是割裂或者间断的，而是呈现为一种互补和延续。《乾·文言》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乾》九二爻所处下卦之中位，居上不偏，平常行事当谨慎处之，谨防邪恶之言，始终保持诚挚之心。在刚健有为中存有谨慎之心理，行中庸之道。《乾》九三爻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文言》在阐释时，强调“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龙象表征的刚健精神在这里亦有所缓和，更多的是刚柔结合的德行修养。《坤》六二爻辞“直方大，不习，无不利”，“直”是人们对大地的观感，生物不邪乃为直。古人认为大地是“方”的，大地之大，无物不载。由大地之德推论出人之德，正直、端方、阔大。“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文言》），王弼解释说“始于履霜，

^① 邵雍著，郭彧整理：《邵雍集》，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43页。

至于坚冰，所谓至柔而动也刚”，^①《坤》卦柔顺，活动时却时而刚健，兼具阳刚的特性，柔中有刚。在《坤》上六爻“龙战于野”之时，“阴疑于阳必战。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龙’焉”（《文言》），《坤》卦上六阴爻将发生变化，与阳爻相争的结果是“其道穷也”，上六的纯阴之道已经发展穷尽。阴气至盛，终究要导致阳来，《坤》道穷尽，转入阴阳交合，此所谓“天地生生之德”。可见，《乾》《坤》刚柔互补，共同演绎龙马之精神。

总的来看，龙马精神体现了君子为实现理想而踔厉奋发的精神，“厚德载物”使命担当的精神，以及“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系辞》）之笃行不怠的精神。正如梁启超先生《论君子》所言：

乾象言，君子自励，犹天之运行不息，不得有一暴十寒之弊……且学者立志，尤须坚忍强毅，虽遇颠沛流离，不屈不挠，若或见利而进，知难而退，非大有为者之事，何足取焉？人之生世，犹舟之航于海，顺风逆风，因时而异，如必风顺而后扬帆，登岸无日矣。

……………

坤象言，君子接物，度量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君子责己甚厚，责人甚轻。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盖惟有容人之量，处世接物坦焉无所芥蒂……望之俨然，即之温然，此其所以为厚也，此其所以为君子也。^②

《周易》的龙马精神呈现为一种勃然向上、强劲有为的精神趋向，但这种刚健的价值取向又渗入了中庸和融的方法和态度。这源于《乾》《坤》阴阳偕作的结果。

《易传》对龙马精神的阐释，不仅包含实践的方法，还指明了实践的目的。就主体而言，首要表现为君子卓然自立而不与世俗同流的精神。“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在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文言》），当主客观条件不满足时，主体选择退避，但仍能志坚守道，以此积储能量，选择合适的时机展现自我。《坤·文言》解释“括囊”，即“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天地运转变化，草木繁衍旺盛，可当地地闭塞之时，连贤人都都隐退

① 王弼等注，孔颖达等正义：《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

② 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十五集·演说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3~94页。

了，盖为谨慎处世之理。《周易》专门设立《遁》卦，具体阐释在困境下选择退避的智慧。《遁·象》曰，“君子远小人，不恶而严”，即在处理与小人关系时，君子要远避小人，尤其是在言语行动方面，不能表露出厌恶之情。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①即对待不仁之人，不要逼迫太紧，否则会出乱子。《遁》卦所言隐退，并非消极避世，而是当发展受阻时，可暂行退避，身退而亨通。世俗的力量常常很难抗拒，但在与之发生冲突时，选择合适的退避方式，依然能够保持自我挺立，也并不会因此而消沉无闷，这亦体现了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当然，适时退避还只是一种消极的选择，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在本质上更多展现为一种积极的价值取向。《乾》《坤》两卦反复强调：

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乾·文言》)

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乾·文言》)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坤·文言》)

在这里，刚健柔顺的价值原则与积极进取、唯利民的精神相结合，不仅体现于君子龙马精神品格的塑造过程，而且指明了龙马精神最终的目的和方向。龙马精神的内涵丰富，能量强大，把“穷神知化”(《系辞》)作为人生哲学的最高境界，把“发于事业，美之至也”(《坤·文言》)奉为人生的大事业，唯有利于民之事才是最伟大的。《坤·文言》中对君子之德含于内又发挥于外多次美颂。《易传》对龙马精神的阐释，更加深刻地显明主体自身的力量。

龙马精神不仅是君子刚健向上的精神力量，而且还呈现为生生不息的过程。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何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文言》)

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

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系辞》)

《易传》认为宇宙中天地氤氲、万物化醇，阴阳交感推动事物的发展变化，发展变化才会有前途。周而复始、物极必反是事物发展的规律，由此产生了万物永恒的变化以及不断的平衡。君子能顺应天地宇宙的变化大势，“而个体一旦真正融合于绵延不绝的宇宙之流，便能超越有限（生死），而

^①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82 页。

实现永恒的存在意义：‘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① 宇宙生生不息，个体仅为宇宙洪流中的一个小分子，当两者融合为一体，便形成与天地同久、与日月同辉的恒久价值。

总之，《周易》卦爻辞中对龙马意象的描述，随着时、势、位的变化而运动发展。历经时间的陶冶，到《易传》时期龙马精神的丰富内涵才真正表征出来。乾为阳、天，为龙，龙飞上天；坤为阴、地，用马，马行千里，与龙偕行。所以中国文化中讲龙马精神，主要就是《乾》《坤》两卦蕴含的永恒而壮阔的生命精神，有如天地间的龙马，气象万千，审时度势，配合行动，展现出生命的力度、强度和密度，拓展出积极自由的真我。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龙马精神意为人之“盛德”，“德”具有行为与实践的意义。《系辞》中多次讲到“德”，其内涵与孔子、老子所言之德有所不同。孔子多从伦理角度阐释仁德，老子从哲学角度阐释无为之德。《易传》中的“德”是与“业”联系在一起的，“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系辞》），“德”与“业”间存在一种因果关联。《易传》认为人们最大的德行是善于认识和把握事物的变化奥秘，推及人事，以成就一番功业，正如《坤·文言》所言“发于事业，美之至也”。这便是先人积极进取的创业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便是《易传》时期人们主体意识觉醒的宣言。

三、由《易经》到《易传》：龙马精神的演变

《周易》经传对龙马意象的运用和阐释，使龙马精神的内涵基本定型，也为后世理解龙马精神的历史语境和学术阐释奠定了基础。汉唐时期延续和传承了《周易》经传原本的思路，如虞翻所言，“乾健故‘强’。天一日一夜过周一度，故‘自强不息’”，^②“君子之德车，故‘厚德载物’”；^③干宝解释：“言‘君子’通之于贤也。凡勉强以进德，不必须在位也。故尧舜一日万几，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尼终夜不寝，颜子欲罢不能。自此以下，莫敢淫心舍力，故曰‘自强不息’矣。”^④ 圣贤的立身行事，莫不践行着龙马精神。直到王弼、孔颖达的注解，也依旧从天人关系的视角讲述法天行而成君

① 杨国荣：《善的历程：儒家价值体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7页。

② 李道平撰，潘雨廷点校：《周易集解纂疏》，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8页。

③ 李道平撰，潘雨廷点校：《周易集解纂疏》，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75页。

④ 李道平撰，潘雨廷点校：《周易集解纂疏》，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8页。

子，刚健自强，动行不休，博厚载物。宋明时期在继承前人解释的基础上，更重视人事，并从理学的角度认识龙马精神。王弼以“天地以本为心”，^①而胡瑗则认为天地是永恒不息的创造，生生不已，“天地以生成为心”，^②不断克服汉唐时期佛老的虚无主义价值观。这对后来的程颐、张载都有影响。朱熹《周易本义》从天理人欲的角度理解：“但言‘天行’，则见其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复之象，非至健不能也。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刚，则‘自强’而‘不息’矣。”^③自强体现的是天理，而人的私欲夹杂其间则会影响自强的发挥。明清时期对龙马精神的理解延续程朱理学思想，重在经世致用。“哲学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总是意味着向哲学史上曾经达到的精神高度的回归。哲学总是在回到根源上来，是从根源处出发的一种精神的成长。”^④《易传》之后的易学解释，都在不断地传承和阐释三圣的这一生命精神。那么，回到古经和《易传》本身来看，两者的创作相差五百年之久，历经时间的陶冶，龙马精神实现了由自然物象到精神意义的创造，其间发生了怎样的转换呢？

《周易》经传强调天人相通进而构建价值体系，这是龙马精神演变的基本逻辑进程。《周易》不仅包含对宇宙自然的种种阐释，而且处处显扬着人文精神，天道只是人道的根据。从《易经》到《易传》，从商周到战国的千年时空，正是先人摆脱物象意识向自觉可为的精神意识过渡和发展的艰难时期。卦爻辞反映了时人与自然界的基本关系，自然界的事物具有无限威力以及不可制服的力量，制约着人的行为。人们诚惶诚恐，当占筮结果为吉时，才能有限度地自由活动。而到《易传》创作时，阴阳和刚柔观念被引入，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生变化，效天法地，天人合德，人们摆脱物象的限制，自觉自为地进行精神的创造。天人合一是龙马精神的哲学基础，既是其形成的理论依据，又是其在实践中的道德标准，也是其追求的终极理想。《乾》为六阳爻之卦，《坤》为六阴爻之卦，两卦发展到上九、上六爻时发生阴阳交感，刚柔相变。这意味着“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咸·彖》），一切精神的发展因“道”的变化而生生不息。

在《周易》中龙马精神的内涵由抽象符号与象征意义相结合，形成符号—易象—精神的思维结构，这与《周易》的类比联想思维方式密切相关。

① 王弼等注，孔颖达等正义：《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

② 胡瑗撰，倪天隐述：《周易口义》卷5，《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90页。

③ 朱熹撰，郑同整理：《周易本义》，九州出版社2020年版，第157页。

④ 杨立华：《宋明理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3页。

感悟天道的方法是格物，格有感悟、领悟之意，类比联想思维方式就是感悟天道的一种方法。鲁洪生曾指出，类比联想思维是由具体事物直接推知抽象事理的方法。类比很宽泛，既包括相似，也包括相关，借助一种具体的“象”“数”认识、领悟、模拟，把没有逻辑关联的事物联想成有关联的内容，是一种触类旁通的思维方式。^①《周易》时期没有思辨的术语，普遍是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举也物而以明之也”。^②到了汉代，在《说卦》的基础上又发明创造了无数的“象”，以便对应卦爻辞，易辞与象关系密切。《乾》卦多讲“龙”象的运动方式，《象》在阐释时，认为《乾》卦由两个八卦乾构成，乾象征天，天体运行刚健，正与六爻龙象进取相合，进而联想到刚健、力度等人的生命内涵。《坤》卦辞讲“牝马”，《象》认为《坤》卦由两个八卦坤叠成，坤象征大地，负载的特点与牝马相类。《易传》对龙马意象的阐释基本去除神秘的色彩而被赋予人文的解释，形成了天地之道—龙马意象—主体精神的结构，天人间只要存在某种相似相关的联系，通过直觉联想，便可以把有限的卦象引申出无限意义。类比联想思维方式是中国重要的认知方式，一直到现在仍然存在，但在实际运用中是有缺陷的。心理学上的相似相关联想是正常的，但如果把它看作逻辑的关联则恐有不妥。类比联想思维方式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偶然性和即时性，很多时候不是必然的。从客体上来说，客体有多重属性，引发人们多种不同方向的联想，甚至相反方向的联想。同一属性既可以论证正面，也可以论证反面。从主观角度讲，每个人表达的思想不一样，对同一物的感悟也是不同的。同一人在不同情境下，对同一物联想亦不同，联想具有多向性。

总之，从先秦到明清时期，历代易学家很重视《周易》中的龙马精神，并尝试不断延展其内涵，但都无法跳过或者超越古经和《易传》对龙马精神的阐释，总会不自觉地回归经传本身。《周易》天人相通，将天地自然道德化、人性化，“与天地准”（《系辞》），这意味着将人提高到天地的境界。作为天人媒介的动物易象，龙马不断演绎和深化宇宙间的生命厚度和精神张力。《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命精神是《周易》的根基。“生生之谓易”（《系辞》），从时间和空间来看，《周易》中的生命精神具有普遍性和延展性。因此，《乾》刚《坤》柔，龙马意象表征的生命精神——刚健与厚德，遍布在64卦中。《周易》中的动物意象并不仅是一种单纯的艺术想象或表现手法，还表达着先民对人的本质的一种认知，寄寓先民对人之为人理想和追求。

① 参见鲁洪生：《〈周易〉的智慧》，现代出版社2013年版，第114页。

② 吴毓江撰，孙启治点校：《墨子校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28页。

综上所述,《周易》中的龙马精神主要展现在《乾》《坤》两卦的运转变易中。《乾》以龙为象,展现六龙流转不息的运行状态。《坤》以马为象,表现出牝马之柔顺厚德,但发展到上六爻时便出现龙马相战的结果。《周易》卦爻辞中展现龙马运行的过程,《易传》则建构了龙马意象表征的生命精神。阴阳是构成龙马意象的根本范畴,龙马意象通过阴阳转换实现了对立统一的发展。经文中的龙马所指倾向于约束君权,管理臣责。到《易传》时,龙马意象所指扩充至君子等更为宽泛的群体。

《易传》在阐释龙马意象时摆脱了神秘的占筮形式,赋予其人文精神的意义。《乾》龙蕴含着无限的创生能量,《坤》马与之偕行,展现着永恒而壮阔的生命精神,拓展出积极自由的真我。《易传》对龙马精神的阐释,既包含方法论,也指明实践目的。从主体看,适时退避并不沉闷,而是在保持自我挺立,这是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龙马精神更多呈现的是积极向上的进取,最终实现盛德大业的生生不息,展现永恒而壮阔的生命精神,这是人们主体意识觉醒的宣言。由经到传,实现了从动物意象到精神意义的哲学创造,这与《周易》的论证方式有关。感悟天道的目的是论人事,追求天人合德。感悟天道的方法之一是类比联想思维方式,只要相似相关就存在情意事理的关联。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①表现的是一种深沉的使命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②展现的是浩然之气的精神力量,孔孟儒家不断演绎着龙马精神,使之内化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特质之一。清华大学校训选用龙马精神理念——“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时刻激励着青年踔厉奋发,笃行不怠。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③我们应当以时代精神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构筑中国力量和中国精神。

(责任编辑:陈华积)

①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0页。

②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2页。

③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8页。